

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 核心问题与基本路径

□ 鲁西奇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

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即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中国历史;二是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即所研究的中国历史是谁的中国历史;三是研究目标的主体性,即主要为谁而开展研究。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密切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其中的核心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因为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认识历史,往往决定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及相关观念的使用或创造,也决定了其所界定和追求的研究目标。

研究者在开展中国历史研究时,虽然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其主体性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多元的、变动的或模糊不清的,但就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界定、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以及明确的或潜在的目标而言,不少研究者程度不同地具有并表现出某种立场。总的说来,中国历史研究者(包括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立场,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是“国家”立场。研究者站在“国家”(既可能是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可能是现当代的中国国家)的立场上,主要是围绕(1)“国家”的形成、兴盛、衰退乃至灭亡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统治”或“治理”的成败得失,(2)“国家”的本原、类型、形态、结构及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基础,(3)中国“国家”的形成、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等三个核心问题,从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开展研究。其二是“世界”立场。从“世界”立场出发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两个重要预设:(1)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某种基本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源自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世界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的预设,使研究者可以设定自己的“世界”立场或“自觉意识”,并选择这种立场,进而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出发,通过比较分析,考察中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及其在“统一的世界历史”中的意义。(2)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表现

为“从相对孤立到普遍联系”“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原本相互隔绝、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各地区在历史过程中逐步联系起来,并不断强化此种联系,所以“全球化”乃是一种悠久的、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的预设,使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可以站在“中国”,放眼世界,或者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以世界的目光,观察“中国”是如何逐步建立并强化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联系,分析中国及其区域或地方“构建”或“进入”世界体系的进程。其三是“人”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的立场有两层含义:(1)研究者立足于自身的现实需要、情感、兴趣、好恶、求知欲或价值观念,选择并界定研究对象,并在研究过程中“灌注”其个人性(包括个体的智慧以及求知、求真的诉求),其研究目标乃是表现其个人性,并满足其个人需求。(2)研究者立足于自觉意识的“人”的立场,从“人”的生存、欲望、认知、交往、精神等角度出发,选择并界定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中国历史”界定为“中国人的历史”,是中国各地区人群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其研究目标,乃是探究“中国人”的人性,思考与分析“人”的本质、中国人的本质及其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

二、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无论基于怎样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都是“中国历史”。不同立场的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均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而此种差异正说明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乃是何谓“中国”——“中国”是如何形成的特别是当今之中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看待、认识“中国”——这里的“中国”既可指中国这片土地、生活在中国土

地的“中国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可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中国,亦可指“人”(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认识、理解或“认同”的中国。质言之,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中国”。无论站在“国家”立场、“世界”立场,还是站在“人”的立场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大多数研究者都会承认:(1)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是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此即“中国文明的连续性”;(2)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持续保持着政治的相对统一,形成了疆域广大、内部复杂多样的政治体,此即“中国政治的统一性”;(3)经过百余年来的摸索,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功,此即“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三方面认识,已成为大部分中国历史研究者(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国外学者)的基本共识。而探究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过程、分析并解释其成因与意义,既是很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出发点,也是其共同追求的目标。

三、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研究中国历史,其最终目标不外乎去思考并尽可能地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世代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怎样生存、发展并创造自己的文明的;二是中国文明、中国历史在人类文明、世界历史上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三是中国历史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当下的中国、世界,以及设想、建构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一个问题的目标,是揭示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人类共性”,是立足于中国看人类、看世界;第二个问题的着眼点,是揭示中国、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的特性,其前提是需要对人类、人类文明、世界历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把握;第三个问题的出发点,则是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是“站在今天看过去”,其前提是对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与把握。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方法论原则就应当是:站在当今的中国,去看中国的过去;再放开眼界,去看当今的世界及世界的过去;然后回过头来,以历史和世界的眼光,重新认识、理解当今的中国,并思考其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当今的中国与世界,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探索与认识,乃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田野”。历史学者无法真正回到“历史现场”,却生活在累积着历史的当下,因此,“进入”包含着历史过程的当今中国与世界,乃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田野工作法”。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当今的中国人,生活在当下的中国,并去感受、认识世界的变化,进而以一种全球化的眼光,去观察、认识、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文化。二是作为当今的中国学

者,在当下已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开展学术研究,和中国及世界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一起研究中国(历史学者是从“过去”认识中国),所以,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界,乃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另一个“田野”——在这个“田野”中,中国历史研究者去观察、认识、理解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如何认识中国。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田野工作法”,并不仅仅是到名胜古迹去访古探幽,或者到穷乡僻壤去看庙寻谱,研究者想象自己与生活于斯的乡人或“古人”“处于同一种情境”,并对后者给予“同情之了解”,从而得以“走向历史现场”,并进而尽可能真正地认识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应是真正地生活在当今中国和世界上的中国人,以及和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一样,真正地研究中国、中国的人、中国的社会以及其他——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才能真正做到在“中国的田野”中研究中国,才能真正地与其所研究的中国、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同呼吸、共命运。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也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研究。

中国历史资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既给中国历史研究者带来诸多便利,也导致了研究工作的繁重和巨大的困难,对此,前人已有充分认识,并摸索出诸多鉴别、分析、运用史料以认识史实的方法与路径。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中国历史资料不仅是丰富的、复杂的,其多样性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中国历史文献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为载体的多样性(如文献史料、物质史料、口述史料等)、来源的多样性(如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等)、类型的多样性(如系统的历史著述、文书、书信、日记、回忆录等)、性质的多样性(如官方文献、民间文献、私人文献等),也表现为历史资料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或制约而形成的诸多差异,更表现在历史资料所叙述的“历史”本身就是多层次、多元的、多样的,是不同人群、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历史资料”——在同一历史过程中,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方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是不同的,其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不完全一样的,其所关注的方面也会有很大不同。历史资料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历史叙述及其所叙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并深刻地影响着以之为基础的历史解释的多样性。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就应当充分重视中国历史资料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从多样、多元的史料出发,梳理历史叙述及其所叙述之史实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分析其成因与意义,并进而探求“统一的中国历史”的史实。

■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
第3期,约18000字